

苏轼的儋州功绩

□ 邓凌月



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这首《自题金山画像》是苏轼去世2个月前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所作，可谓是作者回首往事，对自己人生功业的一个总结。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苏轼（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），才华横溢、青史有名，但其仕宦生涯却十分坎坷，屡遭贬谪。海南儋州是苏轼仕途中最后一个谪居地，此地远离中原、孤悬海外，而被贬之时，苏轼已过耳顺之年，年事已高。按说儋州本应是他人生凄凉地，但他却把这里视作自己建功立业的重要地方，待他3年后离开海南时，留下了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的诗句。

宋哲宗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，苏轼被贬至琼州昌化军（今海南省儋州市）安置。海南岛自隋代方始设郡，至宋代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。远离京城，“鸟飞犹是半年程”；自然条件艰苦，“天气卑湿，地气蒸溽，而海南为甚”，当时被贬至海南的官员大多心灰意冷。初到海南，苏轼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”，但他毫不畏惧艰难处境，以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与海南百姓交往并有所作为。他帮助疗救百姓疾病，带领百姓弃旧习、务农桑，开辟学府、讲学明道，在海南的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苏轼在海南，依然受到朝廷权臣的压制。他虽官任琼州别驾（知州的佐官），但朝廷对他下了不得食官粮、不得住官舍、不得签书公事三条禁令。苏轼本可不理政务，清闲度日，但他始终关注民生疾苦。苏轼居儋耳，发现当地百姓习于取咸滩积水而饮，以致常年患病。于是，他力劝大家改变这种习俗，并带领百姓勘察水脉，挖了一口地下水井，取井水饮用。远近百姓纷纷效仿，改变了直接饮用沟渠积水的习惯，疾病大为减少。

当时海南流行一种传染病——疟疾，百姓缺医少药，只得转而求助于巫术。苏轼曾在《书柳子厚牛赋后》中描述此情景：“病不饮药，但杀牛以祷，富者至杀十数牛。死者不复云，幸而不死，即归德于巫。以巫为医，以牛为药”。苏轼一面亲自到乡野采摘草药，一面托人从广州太

守王敏仲那里要来黑豆，制成辛凉解毒的药物——淡豆豉，用药食两用之法为民祛病，疗效甚好。后来，当地百姓广泛种植黑豆，配以草药，终于治好了疟疾。

由于当时海南交通闭塞，仅有少量船只与内陆中原地区相通，因此与中原文明几近隔绝，大多数地方还在“刀耕火种”。当地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，经常食不果腹，而土地却大量荒芜。苏轼创作了诗歌《和陶劝农六首》，劝说百姓改变“不麦不稷”“朝射夜逐”的落后生活方式，阐释“春无遗勤，秋有厚冀”的农耕之理，鼓励百姓“云举雨决，妇姑毕至”，并带领百姓改进农具，开垦荒地，教之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之术，改善了当地百姓吃不饱饭的状况。

由于与中原地带长期隔绝，海南文化发展相对迟滞。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，整个海南从无一人考中举人或进士。宋哲宗绍圣五年（1098年），苏轼始于儋州的载酒堂内讲学，传授儒家诗书礼义之道，使“蛮荒之地”的海南渐渐出现“书声琅琅、弦声四起”的文化景观，“乡人多受其惠”。由于苏轼是蜀州人（今属四川省），因此讲学所持为蜀地之语，此种语言，较当时海南地方口音更易让人听懂。因此，苏轼的讲学，也使得海南与内陆地区的语言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顺畅。时至今日，儋州地区的口音较海南其他地区都略有不同，其尾调颇似四川口音，儋州人形象地称之为“东坡话”。

在苏轼的学生中，姜唐佐是颇有才华者。姜唐佐上广州应考时，苏轼赋诗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珠崖从此破天荒”，对其极尽勉励之词。待苏轼北归中原后的第三年，姜唐佐考中举人，成为海南的第一位举人。不久，学生符确考中进士，成为海南的首位进士。之后，海南人才辈出，至清光绪年间（1906年）科举考试废除时，共出举人767名、进士97名。其中，苏轼被贬谪的儋州地区，受苏轼讲学教益最深，考取功名的人数比海南其他地方的人数都要多。海南第一位进士是1109年及第的符确，最后一位进士是1889年及第的王云清，虽相距近800年，却均为儋州人，因此有“进士首儋尾亦儋”之说。明代海南进士唐胄编撰的《重建儋州学记》中记载：“琼之有士始于儋，琼之士亦莫盛乎儋”，真实再现了海南儋州当时鼎盛学风。清代戴肇辰等学者撰《琼台纪事录》，其中谈道：“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，讲学明道，教化日兴，琼州人文之盛，实自公启之。”

海南三年，苏轼倾心著书立说，续写完成了《东坡易传》《东坡书传》《论语说》3部经学著作，撰写文章160余篇，创作诗歌170余首。苏轼在海南的作品流传至中原后，成为中原人士了解海南风土人情的一个窗口，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赞曰：“东坡岭外文字，读之使人耳目聪明，如清风自外来也。”受苏轼的影响，今天的儋州人依然喜欢吟诗作对，不仅有许多民间诗社，就连儋州的山歌都酷似格律诗。儋州文化的兴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，2002年，儋州先后荣获“全国诗词之乡”“中国楹联之乡”的荣誉称号；2021年，儋州荣获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的荣誉称号。

宋哲宗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6月，苏轼接到大赦的诏令，北返中原。启程时，前来送行的百姓和学生络绎不绝。他在《别海南黎民表》中深情地写道：“我本海南民，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，譬如事远游。平生生死梦，三者无劣优。知君不再见，欲去且少留。”

苏轼北返中原后，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继续讲学，教化乡里，海南岛也因此人才辈出。明朝时期的海南人薛远，考取进士后从政，官至户部尚书、兵部尚书，成为海南第一位尚书郎；清朝时期的海南人黄河清，考取进士后，回到海南设馆执教，每年授徒百余人，成为一方名师……

苏轼被贬至儋州，后人素有“东坡不幸海南幸”之说。时至今日，海南人民一直对苏轼怀有深深的敬意，在海南流传至今的东坡村、东坡井、东坡田、东坡路、东坡桥、东坡帽、东坡墨、东坡话等等带有历史印记的文化符号，无不表达了人们对他的眷恋和感激。



《四书》中的义利观

□ 谢 天



“四书”是四部儒家经典的合称。四书五经，是重要的儒家经典著作，西汉之后学五经，南宋之后学四书。南宋理学家朱熹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在一起进行注解，称其为四书，“四书”之名始立。义利之辨，是指中国古代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争辩，与传统社会个体的自我修养及国家治理密切相关。《四书》对义利之辨有丰富的理论阐释，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义利观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第一次论及义利关系时，就鲜明地提出了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观点，孟子更是从多个角度来详细阐释义利关系。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内涵极为丰富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深远的时代价值。

强调个人修养

准确理解《四书》中的义利主张，可以从朱熹的相关解释谈起。朱熹所著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是《四书》影响力最大的注本之一。朱熹对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解释是“义者，天理之所宜。利者，人情之所欲”。朱熹把“义”理解为天理，把“利”理解为人欲，显然是源于他自己的理学思想中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主张。朱熹认为，在孔子的思想中，人情欲望对于个人修养起负面作用。

那么，先秦儒家是否真的批判

否定人的欲望？尽管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、理学大家，但他关于“义”“利”的解读始终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。在《四书》中，孔子肯定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”。显然孔子并不反对人的致富欲，只是不赞成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。先秦儒家重视人的情感欲望，认为正是因为欲望，个人才能和他人相互感通，仁道才因此而重要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如果没有“欲”，就没有理解他人的可能性。可见，人情欲望的存在是被孔子肯定的。

不同于朱熹完全否定“欲”的主张，先秦儒家所批判的“利”是“私利”，而不是人所有的欲望。“私利”意味着只考虑自己的欲望而不顾他人；“义”也应该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，但“义”人不是单虑及自己，而是重在为公。先秦儒家的“义利之辨”指出，如果每个人只顾（私）利，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争斗。

孟子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理解孔子的“义利之辨”的。《孟子》开篇就强调：“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履。”如果以利为先，人眼里没有他人的利益，那争夺就不会停止。正是出于这种思虑，儒家提倡了“礼让为国”。因此，在伦理关系中能做到以对方为重、在政治事务中能做到以公益为重的人物，会受到儒家的敬重。孔子在臧否古今人物时，高度称赞吴太伯、伯夷、叔齐等以“让”德著称的人。他说：“泰伯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！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对于君子而言，财产之类的利益，应该是由他提高自身修养的工具；对于小人而言，他们放弃了个人修为，一生忙忙碌碌只为了追求财富，而忘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。正如《大

学》中所说“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”。可见，先秦儒家强调“公”和“私”的区别。先秦儒家认为，只有超脱个人得失，做到心中有他人，以天下为重，才能走向“义”的境界。

主张民本仁政

君子以义为先，并不意味着先秦儒家完全否定“利”的意义。“君子”和“小人”在先秦有着两种含义：一种是指人品行修养的不同，君子是有德之人，小人是无德之人；另一种隐含政治地位的区别，君子是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，小人指普通百姓。因此，先秦儒家对于义利关系的讨论不仅局限于个人修养，而且上升到政治层面，探讨如何能够平衡“义”和“利”的矛盾，进而实现善治。义利观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仁政和民本思想紧密相关。儒家主张，不能简单用道德说教方法来统治，还需要满足老百姓对“利”的需求，这是仁政的前提。

在先秦儒家看来，对于有修养的人来说，仁义就像日常需要那样不可或缺，《论语》中主张喜爱仁义就应该像喜爱美食那样自然。但是，这只能是对于君子而言。而普通百姓在面对利益时，可能难以严守道德标准。遇到此种情形，儒家反对严刑峻法，主张民本政治，强调反思为政之道。孟子说，“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”。在《论语》中，曾子提到，当法官（士师）遇到老百姓犯罪的情况，即使坐实了其罪行，也应该考虑为政者的过失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孟子主张不可只惩罚罪恶行

为，而不去考虑背后百姓生计的困难：“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？”仁政并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，而应重视百姓的日常生活。《中庸》中强调：“道不远人。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”而仁政的第一步，首先要解决老百姓急迫的温饱问题。就如《孟子》中所说的：“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。”当老百姓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，方可通过礼乐教育来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。《管子》也言：“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显然，顺序不可颠倒，否则，一切礼乐教化都无法发生作用。同时，统治者也应该以百姓之利为利，而不是谋求自身财富的聚敛。在战国时期，各国君主出于战争需要，强迫百姓开垦荒地。儒家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，因此提出了“以义为利”，《大学》中指出，“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，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”。

《四书》对“义利之辨”的解释体现了儒家义利观的丰富内涵。其“义利之辨”既有对个人修养方面的强调，又有其民本仁政的意义。对于个人修养来说，“义利之辨”的意义在于强调“公心”对“私心”的超越。要想成为一名君子，应该做到“仁以为己任”；对于为政治理而言，统治者不能简单说教，而应以满足百姓物质需求为要，必须做到义利兼顾。《四书》中的义利观体现了儒家中庸之道的修身和处世哲学，展现了儒家先哲的风骨和智慧，2000多年来，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志趣、价值选择以及安身立命之道，值得后世不断研究和借鉴。

诗意的端午

□ 褚振江

中华文明有采风记俗的悠久传统，这种传统孕育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理想追求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，端午节自诞生起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之一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感染力。

和端午节相联的，不仅仅是花草和粽子，它还与一位伟大的诗人密切相关，使这个古老节日具有更深的气蕴，确切地说，应该是诗的韵味。端午节的别名中，有“诗人节”和“屈原日”，或许是这个传统节日真正的意蕴。

诗词歌赋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华民族抒发情感的丰富表达方式。历代文化名人吟咏端午、逸兴遣怀的诗文不知凡几，而屈原是常见的主题。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，他的诗歌《九歌》《离骚》《天问》，表现出高尚的人格、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。诗品源自人品，文心辉映诗心。人们想到端午就会想到屈原，想到他充满浪漫主义和爱国情怀的诗魂。唐代诗人文秀有“节分端午自谁言，万古传闻为屈原；堪笑楚江空渺渺，不能洗得直臣冤”；刘禹锡有“曲终人散空愁暮，招屈亭前水东注”；李白作“屈平辞赋悬日月，

楚王台榭空山丘”；宋代张耒有“竞渡悲深千载冤，忠魂一去讵能还。国亡身殒今何有，只留离骚在世间”；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有“情知不向瓊江死，舟楫何劳吊屈来”……这些诗词所抒发的浩然民族正气、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、忠贞高洁的道德胸襟、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，历经千年沧桑，早已成为国人的文化底色。

天中节，是端午节的别称。苏轼的词《六么令·天中节》，将人生体验、生命思考、事物观察凝聚到诗词之中，以其意象和才思击中人心，精当易晓，韵味悠长：

虎符缠臂，佳节又端午。门前艾蒲青翠，天淡纸鸢舞。粽叶香飘十里，对酒携樽俎。龙舟争渡，助威呐喊，凭吊祭江诵君赋。感叹怀王昏聩，悲戚秦吞楚。异客垂涕淫淫，鬓白知几许？朝夕新亭对泣，泪满胭脂处。汨罗江渚，湘累已逝，惟有万千断肠句。

苏轼的词，犹如一幅笔墨灵动的国画长卷，描绘出端午节的风俗景象，门前挂艾草菖蒲，天上飞纸鸢风筝，包粽子，喝雄黄酒，赛龙舟，凭吊屈原。诗中的

“湘累”，是指屈原。“湘累已逝”，惟使后世无限的哀思和祭奠。此外，苏轼写端午的词还有一首《浣溪沙·端午》：“轻汗微透碧纨，明朝端午浴芳兰。流香涨腻满晴川。彩线轻缠红玉臂，小符斜挂绿云鬟。佳人相见一千年。”亦描绘了彼时端午的民间习俗。

追思屈原，是大多数端午诗歌的主题。因此，格调悲壮，诗情沉郁，语近情遥，余音袅袅构成了端午诗歌的风格，与咏诵其他传统节日诗歌的喜庆欢乐大相异趣。

端午节还有“艾草节”之名，是因为端午风俗与草息息相关，写草叶的端午诗歌也非常多。歌谣曰：“五月五，是端阳。门插艾，香满堂。”蒲剑驱邪，艾条芬芳，家家包角粽，缝香囊，斗百草，沐兰香，避五毒，饮雄黄。端午的气息，当然不仅仅是粽子的香味。挂在门口的艾草菖蒲散发着清香，喷洒的雄黄酒、那些浸染着雄黄、艾草、茴香和花香的彩色香袋，也在不同的角落氤氲着淡淡的清香。民间诗云：“端午时节草萋萋，野艾茸茸淡着衣。无意争颜呈媚态，芳名自有庶民知。”写艾草之香、端午

之情，那草在端午便被赋予了民俗意义，也有了人文色彩。潮州人有《端午》诗：“家家插艾望消灾，欲食棕球兴满怀。”可见，“吃粽插艾”这一民俗，弥漫着人间烟火气。陆游的“盘中共解青菰粒，衰甚犹簪艾一枝”“粽色分两髻，艾束著危冠”，写艾写粽的诗文之美透过千年风雨让人心生喜乐温暖，包完粽子以后，头上还插了艾草。这些细节，让日常的生活有了更多仪式感，也因此让端午节增添了几多雅趣。

端午节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时间节点和文化传承。在这个历史悠久节日里，既有“五月榴花妖艳烘，绿杨带雨垂垂重”的景致，又有“彩线轻缠红玉臂，小符斜挂绿云鬟”的风情，更有“屈子冤魂终古在，楚乡遗俗至今留”的厚重，饱含家国情怀与民俗趣味，持有诗性风范和艾草灵性。在浓浓诗香中品味端午，能够激活历史传统、唤起文化记忆，塑造民族的精神气质，凝聚深沉的民族情感。

自得园

